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19

文化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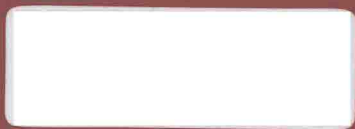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
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德〕扬·阿斯曼 著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Jan Assman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
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德〕扬·阿斯曼 著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Jan Assmann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0-07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德)阿斯曼(Assmann, J.)
著;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25261-1

I. ①文… II. ①阿…②金…③黄…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1042号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07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书 名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著作责任者 [德]扬·阿斯曼 著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责任编辑 陈 甜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26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4.25印张 296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

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表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

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不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

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 年 5 月

目 录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I

前 言 1

导 论 4

第一部分 理论基础

第一章 回忆文化 21

绪 言 21

一 对“过去”的社会性建构:莫里斯·哈布瓦赫 27

二 集体回忆的形式——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 41

三 文化记忆的类型:“热”回忆和“冷”回忆 62

第二章 书写文化 85

一 从仪式一致性到文本一致性 85

二 卡农:如何界定此概念 103

第三章 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 133

一 认同、意识和反思性 133

二 民族的产生作为对集体认同的基本结构的升级 150

第二部分 个案研究

绪 言	173
第四章 埃 及	177
一 埃及书写文化的基本特征	177
二 充当“法则”的王朝后期神庙	189
第五章 以色列与宗教的发明	212
一 作为抵抗手段的宗教	212
二 起到回忆作用的宗教：《申命记》作为文化记忆术的范例	231
第六章 法律精神促成历史的诞生	247
一 表现为惩罚与拯救的历史	247
二 以意志神学为标志的历史被神学化：从“超凡的事件”到“超凡的历史”	269
第七章 希腊与思维的规训	280
一 希腊与书写文化的结果	280
二 荷马与希腊民族的形成	294
三 接合性：希腊的书写文化与思想进化	304
结 语 文化记忆理论概述	318
参考文献	328
人名索引	350
内容索引	358
译后记	368

前 言

近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题的研究风气方兴未艾。它大约始于十年前,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人就此著书立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相信,根源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大变革,其中

11

有三个因素使得记忆这个课题受到空前的重视。首先,随着电子媒介技术开始在人的大脑之外储存信息(也就是人造的记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一场文化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时间上更早的文字的出现。其次,因为有了上面所说的媒介技术,业已结束的年月——即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旧欧洲”的记忆——也得以保存,它至少需要我们不时回忆并以评判的方式予以消化,乔治·施泰纳(George Steiner)称其为“轮作”(Nachkultur)。第三个因素可能最具决定性,它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亦即,那些曾经亲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和灾难的一代人,仍然健在的越来越少了。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四十年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门槛,换句话说,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在我看来,尽管有关历史与记忆、回忆与记忆术的讨论有时使用非常抽象和专业的术语,仍然持续受到关注,其关键就在于第三个因素。所有这些都说明,以回忆概念为核心,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科学范例,受其影响,不同的文化现象和领域——艺术与文学、

政治与社会、宗教与法律——呈现出不同于之前的格局。换句话说,有关记忆与回忆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本书旨在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作者不敢断言已经实现了某种目标,而只能说供给读者一些提示,重点是为读者自己寻找答案勾勒出必要的因果关系。

- 12 1984—1985年,作者偕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赴柏林科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本书就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晶。因此,我最诚挚的谢意应当献给这家学术机构,在那里,我有幸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通过讲座、交谈和讨论等形式进行交流,假如没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很难想象本书作者会如同书中内容所展示的那样,做出跨越自己的学科——埃及学——的大胆尝试。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彼得·马基尼斯(Peter Machinist)、米歇尔·斯特里克曼(Michel Strickman)与我一起就比较文化科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和密切的讨论,在此向他们诸位表示特别的谢意。

本人参与的研究小组“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Archäologie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所关注的题目之一便是“文化记忆”问题。在研究小组出版的系列图书《文字与记忆》(1983)、《正典与审查》(1987)和《智慧》(1991)当中,文化记忆都是主要论题;此外,在海德堡举行的研讨会和讨论课上,参与者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为这些研讨会所做的准备,以及之后所做的归纳和提炼,为此书奠定了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在柏林科学院举行的题为“正典与审查”的第二次研讨会。本书的初稿实际上是作者与阿莱达·阿斯曼在柏林为《正典与审查》一书撰写的导言,只是我们发现,在导言有限的篇幅当中无法充分地讨论文化记忆问题,因为当时拟就的文字已经达到一百五十页之多,只好作罢。在此后的若干年中,我们共同的研究几经中断。虽

然两个人出发点相同,但是研究方向各异,遂决定分别把各自的研究进行到底。阿莱达·阿斯曼的研究成果呈现为《记忆空间: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建构》(*Erinnerungsräume. Zur Konstruktion kultureller Zeit*)。她的着眼点在于古典时期至(后)现代形成的文化记忆具有哪些形式与功能,其著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本书的后续,因为我在书中重点论述的是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早期书写文化。

1987—1988年,我得以利用学术假期完成本书的第二部分。本书涉及理论方面的第一部分,得益于为讨论课和研讨班备课的过程,这些课程分别是我与托尼奥·赫尔舍(Tonio Hölscher)合开的“文化与记忆”(1986/1988),与迪特里希·哈特(Dietrich Harth)合开的“革命与神话”(1990),以及我与阿莱达·阿斯曼、迪特里希·哈特合开的“作为生活空间和纪念物的文化”(1987/1991)和“摩涅莫辛涅”。以上同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我确实获益匪浅。本人先后在不同的研究班和研究机构做过相关的学术报告,如在弗赖堡大学,面向参与专题研究项目“口述与文字记载”的师生以及名为“古典时期依据当下建构起来的过去”的研究生班,还有在斯图加特文化理论中心,以及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在上述大多由阿莱达·阿斯曼陪同的讲座中,作者获得了宝贵的机会,与听众就书中的核心论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由起初一系列尝试性的研究项目变成了一本书,不足之处肯定不少。不过,如果没有维肯伯格(E.-P. Wieckenberg)的鼓励和催促,恐怕连这样的结果也难以想象。

扬·阿斯曼

1992年

导 论

15 《摩西五经》中出现过四次要求将仪式和律法的意义教授给子孙后代的场景：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申命记》6:20 及以次）^①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甚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出埃及记》12:26—27）

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甚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13:14—15）

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出埃及记》13:8）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关于人称代词和历史回忆的一小幕戏

^① 中译文引自《圣经》简化字新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2006，下同。——译注

剧。对话中的儿子时而说“你们”，时而说“我们”（例如“我们神”），父亲回答的时候，也是时而说“我们”，时而说“我”。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仪式事实上是要让孩子们理解先祖们离开埃及的历史，由此也引出了关于这四个孩子如何学习《米德拉什》^①的片段。这四个问题（包括《出埃及记》13:8 中未提出的那个问题）分别指向四个不同的孩子：聪慧的、邪恶的、头脑简单的和尚不知如何发问的。聪慧的孩子的聪慧之处在于，他会区分不同概念（“法度、律例、典章”），并且在“你们”之后补充“我们的神”。父亲在对他讲述这段历史时，使用的人称代词是“我们”，这个“我们”把提问者包括在内。邪恶的孩子的邪恶之处表现在，他使用的是将自己排除在外的人称代词“你们”：

邪恶的孩子如何发问？“你们行那礼有何意义？”不包含他自己，而是“你们”！那么，既然他将自己从整体中分离出去，你就可以将他置于一旁以使他的邪恶不能危害别人，并回答他说“所以在我出埃及的时候，神才赐予了我这些”：我，而不是他。（《逾越节哈加达》[*Pessach-Haggadah*]

16

我们所研究的三个问题在这一小幕戏剧中得到了展现：关于与“我们”“你们”和“我”相关的身份认同（*Identität*）问题；对出埃及的历史的回忆问题——这段历史最初创建并继续构建了“我们”这个整体；在父亲与儿子的问答中所展现的（文化意义的）延续和再生产问题。在逾越节的庆典中，孩子被纳入了一段构建并

① 《米德拉什》，Midrasch 的音译。Midrasch 在希伯来语中是“解释”“阐释”的意思，即犹太教对《圣经·旧约》的注释，成书于公元 6—10 世纪。《米德拉什》全书分为两部分：《哈拉哈》（*Halacha*）和《哈加达》（*Haggadah*）。《哈拉哈》讲解经文中的律法、教义、礼仪与行为规范，并说明其在生活中的运用，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哈加达》阐述经文的寓意和故事传奇，并对逾越节仪式和祈祷进行指导。——译注

填充了“我们”这个整体的历史和回忆,从而学会了说“我们”。^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和一个过程,它们构成了任何一个文化的基础,但却很少像在这个例子中以如此直观明了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们在此书中所研究的是下面三个问题之间的关联:回忆(或者:对过去的指涉[Vergangenheitsbezug])、认同(或者:政治想象[politische Imagination])和文化的延续(或者:传统的形成)。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Konnektive Struktur),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凝聚性结构可以把人和他身边的人连接到一起,其方式便是让他们构造一个“象征意义体系”(贝格尔/卢克曼[Berger/Luckmann])——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这个空间起到了连接和约束的作用,从而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且为他们指明了方向。这一文化视角在古代文明的文本中以关键词“公正”的形式得到了梳理。凝聚性结构同时也把昨天跟今天连接到了一起:它将一些应该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且使其保持现实意义,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当下”的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这一文化视角是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基础。规范性和叙事性的两个方面,即指导性方面和叙事性方面,构成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基石,使得个体有条件说“我们”。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对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回忆,这两点支撑着共同的知识 and 自我认知(Selbstbild),基于这种知识和认知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方才将单个个体和一个相

^① 宗教中将使用问答法来讲授教义作为回忆历史和建构主体同一性的形式,参见德·普瑞/勒默尔(de Pury/Römer)1989。